

太阳岛

副刊

聆 听

——王蒙先生来哈点滴记事

□孙建伟



王蒙先生,1934年生人,中国当代作家、学者、原文化部部长,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。2019年,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,授予王蒙“人民艺术家”国家荣誉称号。之前只是在书籍杂志或影像资料里看到王蒙先生,对他的了解和敬佩还是平面化的。2024年8月末,因为工作的关系,我有幸与这位德高望重的人民艺术家近距离接触,被他身上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。

8月29日中午,已近鲇背之年的王蒙先生坐了近5个小时的高铁,风尘仆仆从北京赶来。在哈西高铁站接到他的时候,虽然略有倦意但仍然兴致不减,他边走边说,高铁真是个神奇的东西,从北京到哈尔滨这么远的距离,几个小时就到了,中间只停两站,沈阳、长春。哈尔滨西站我是第一次来,环境很好,哈尔滨这几年变化很大,特别是旅游发展全国闻名。去年冬季的“尔滨”热不得了!

在去往宾馆的路上,他依旧兴致勃勃,我前些年多次来过哈尔滨,不同季节的哈尔滨我都领略过,哈尔滨的中央大街、太阳岛、索菲亚教堂我都去过,秋林公司很有名,我在那儿买过格瓦斯、大列巴、黑鱼籽、红鱼籽,还有三文鱼。在文化部工作的时候,我有一年受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邀请来哈参加一个国际红学的研讨会,记得当时哈尔滨师范大学有一批喜欢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人。

王蒙先生对哈尔滨的印象出奇的好。夏天我在松花江上乘坐过小快艇,在湿地欣赏了各种各样的飞禽;冬天我在松花江上看过冬泳,还看过雪雕、冰雕。严寒可以对人产生威慑,但反过来又能成为旅行、体育和欣赏、观景的一种非常美好的经历。哈尔滨将这种特色进行了“美化”,让人们享受严寒,而不是抱怨。对于即将到来的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,王蒙充满期待,在哈尔滨举办冬奥会非常合适,它具备了冰雪资源丰富、雪期长的特点,我相信哈尔滨一定能把亚冬会办得很好。

当路过哈尔滨站北广场伊维尔教堂时,他随即问道这个洋葱头建筑是什么风格的建筑?我们告诉他这是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,他频频点头,哈尔滨的建筑风格多样,我还记得索菲亚教堂的风格是拜占庭式的,这样风格的教堂全世界有3座,伊斯坦布尔、大诺夫哥罗德、哈尔滨,我都参观过。

抵达马迭尔宾馆后,他饶有兴致地说,马迭尔宾馆是一位俄裔犹太人建造的,我每次来哈尔滨都来这里吃饭,这次干脆直接住这儿了。在去往房间的途中,他认真细致地观看历史图片,当看到郭沫若的照片时,他凝视了一下,这些照片我看过很多次。由于还要参加下午的“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‘时代之歌’王蒙作品朗诵会”,他说,怎么说也到了这个年纪,我要简单休息一下,养足精神参加活动,午饭就不吃了。

我们再次在他房门前等候时,他丝毫不差按照约定时间打开房门,穿上了西服,系上了领带,与我们一道前往朗诵会现场。步入会场的一刹那,观众不约而同起身鼓掌,向人民艺术家致敬,王蒙先生举起双手向大家致意,会场在观众与艺术家的相互注视中升高了温度。在接受主持人采访时,他坦言,哈尔滨是全国知名的城市,也是东北几个主要城市之一,无论

城市的历史、市容还是人民的生活方式,都可以看出中国式的现代化。它有东北人的豪放和热情,又受到俄罗斯等邻国国家的影响,因此还具有开阔性。尤其是迟子建撰写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的作品,使人们对哈尔滨的兴趣越来越大。而随着近几年旅游热,国内游客都选择来到哈尔滨,这都是让哈尔滨越来越自信的体现。

“时代之歌”王蒙作品朗诵会分为5个篇章,12个节目,朗诵者的深情演绎让王蒙先生沉浸在往日的思绪中难以释怀。他深情地说,我非常感谢大家的朗诵。朗诵是一种解读,也是一种传达。刚才朗诵的文字里有这么一句话: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的,只有这个作品到了你那里,才能使作品直抵读者的内心。王蒙先生对“时代之歌”朗诵会的内容给予充分认可,文学在文化中是非常容易被注意到的,是直接达到人们心灵和记忆中的东西。我们无论谈论到哪个民族、哪个地区的文化,都会想到那里的作家、作品,以及戏剧、电影等等。他说,当青春与文学结合后,青春就被留在了。我常常说,因为有《红楼梦》,所以当我们谈到林黛玉的时候,她最多只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——虽然已经过去了几百年,但她还是那个小女孩。

正如朗诵会篇目《说给青年同行》中提到的,“读书使我充实,阅读使我开阔,阅读使我成长,阅读使我聪明而且坚强,阅读使我绝处逢生,阅读使我在困惑中保持快乐地前进。”在节目最后,王蒙先生对现代年轻人的寄语是:“要学习”,一个人的一生,一辈子就是靠学习,青年人更要保持学习状态,要沉得住气、静得下心,什么事都有一个过程。

朗诵会结束后,他特意叮嘱我们,这两天行程较紧,我想早点休息,后面的参观活动麻烦取消吧,以免让大家等待太久,我也能吃个安稳饭,要不然我老惦记着。一个心中时刻装着他人的人,不能不让人心生敬佩。

第二天一早,他按点起床吃饭,吃得也很简单,一个茶叶蛋,一根油条,一杯奶,夹了一点点青菜。然后乘车来到市文联参加向经典学习、向人民艺术家致敬“与时代同行”文学创作座谈会。会上,哈尔滨各个年龄段的作家纷纷踊跃发言,充分表达自己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感悟。当听完大家的发言之后,他作了一段长达30分钟的即兴发言。

王蒙说,我写了70多年了,到今年为止还没停,今年夏天我还写了一个中篇小说,一个短篇小说。这么大学龄为什么还要坚持创作呢?我本身有一个内在的精神驱动力,用一个词来概括,那就是热爱。创作始终要有一股子热劲,这对于长期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。每个人的热劲来源都不一样,比如高尔基,他的热劲与童年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、受不到完整教育经历有关。在这一点上我无疑是幸运的。我从少年时代就参与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。我见到第一个共产党人的时候才11岁,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的秘书,那时候我就和地下党建立了联系。那是不是每个人都走这条道路呢?当然不是。时代就好比风云气象,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。

古今中外,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也各不相同。像曹丕,他是要当君王的人,他说

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。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……”这和他的地位有关系。我在意大利的时候,和多丽丝·莱辛有过特别好的交流,她也来过我的家里。有人问她为什么写作,她说“我是一个写作的动物”。她并没有说激昂慷慨的话,写作的动物是什么?就是我的生命需要这个,我的生活需要这个,我活着的兴趣需要这个,我要自己有所作为需要这个。这就是创作的动力。在“为什么创作”方面表达得非常伟大的,我觉得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。他说,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苦难是对他的刺激。他的一生充满了苦难,包括贫困、疾病、流放和负债;他还因为朗诵一封信而被沙皇以“搞思想上的阴谋”罪名逮捕并判处死刑,临刑时被沙皇赦免,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。所以他的小说总写神经病、被处死人的心情,这和他的经历息息相关。我们反过来讲,你不能对不起所受的苦难,但也不应该辜负你所得到的欢乐/你所得到的恩情。中国人讲究感恩,“涓滴之恩,当涌泉相报”,我每次看到这几个字都要流泪,因为这是伟大、朴素的情感。我们要在时代的风向下,时代的背景下,大步向前。

我们中国作家是非常幸福的,是受到社会关注的。中国是一个历来重视文学的国家。孔子曾经说过“诗可以兴,可以观,可以群,可以怨……”我们今天的写作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要求,更广阔的视野。我们重视土地,重视乡土,重视山河,同时还要重视宇宙,重视这个世界,重视人类文明共同体,重视“一带一路”。

东、邓小平、习近平的著作。要把中国的历史、外国的历史、政治史都研究一遍。能多知道一点是一点。

另外就是突破自我,要有想象力,用想象力扩展自己的人生图景。已经有的、已经熟悉的成就,就这样了。没有的经验、没有的成就,也应该试一试,也许就能做成。没干过的行当,也可以把它写出来。没创业,不等于不能写创业。你没当过间谍,不代表你不能写出“007”。扩展的余地极大,所以写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,但写作也是一个痛苦的事,你会碰到各种困难、各种挑战,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
写《铁鼓》的君特·格拉斯,有一个关于“为什么写作”的回答:因为我别的都干不成啊!我今天说这个话,有人会对我有意见,王蒙带头贬低作家、贬低文学。其实这个回答并不是贬低文学,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,如果你要从文学创作,那就做好准备付出代价。中国古代有很多大作家,都是因为科举过不了关,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蒲松龄但凡科举能过关,他也不能写鬼啊、神啊、狐狸啊;吴承恩但凡能过关,也不能写猴啊、猪啊。所以,说别的都没干成的作家,有一种苍凉,有一种悲怆,表达的意思是说把自己献给文学了。

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·高更的生平为素材,讲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。他人到四十岁了,收入颇丰,家庭幸福。有一天,他夫人发现他状态不太对,心不在焉,有时候还夜不归宿。问又问不出来,就找了一个私人侦探,查一查这人在闹腾什么呢?经过缜密的调

查,发现他喜欢上了艺术了,正在钻研画画。他夫人一听就哭了,如果他喜欢女人了,我可以让他两年内回心转意。如果想抢银行,我现在就报警,判他几年,出来之后,依然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我;如果要是吸毒,我就送他到戒毒院戒毒;但他迷上艺术了,我的人生已经完了,不能再对他抱任何希望了。她付钱给侦探并告诉他,你不得泄露这个消息,如果传出去,我就去法院告你。毛姆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既生动又耐人寻味。在常人眼里,迷上艺术,这辈子就完了。当然,高更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。“满地都是六便士,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”。跟大家引述这样一段故事,是想表达我们要要有献身文学的准备。

王蒙先生在旁征博引的表达中不失幽默,他调侃自己,“我这个耳朵啊,在这次座谈会上,我发现我高估它了。大家的提问,离我三米远的,我都听不太清。但主办方还是想让我这个聋子、看起来写了很多书的人跟大家讲一讲。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幽默小说了。”当听到有

心静气地找,就一定能找到。果然,在卫生间通往卧室过道的墙角边上,半个眼镜片静悄悄地躺在那里,我把它捡起来交到王蒙先生的手里,他欣喜若狂地看着我,连说三句不得了!我们帮助把镜片安上并嘱咐他,回北京再去眼镜店紧一紧。他频频点头。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,王部长,作为奖赏,您能给我的《青春万岁》签个名吗?他爽快地答道,没问题,签一千本都行。他挥笔在书的扉页签上:“建伟兄。王蒙”。

王蒙先生的哈尔滨之行短暂而又丰富,在送行的高铁站台上,他边走边对我说,这个年纪有时候难免犯懒,但我坚持每天走六七千步,每周游两次泳,每次400米,走路我已经坚持了16年了,游泳坚持了70多年,只要你认定对你有益的锻炼方式,你就坚持到底!

临别之际,我握着先生的手,真诚地邀请,欢迎您再来“尔滨”!

我现在写作的时候,写到哪一行,想尽办法最大限度熟悉它、了解它。如果写到吃,最好写得和一级厨师的感觉一样;如果写到穿,最好和中央美院的设计专业的博士感觉一样;如果写到政治,最起码要深入研究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

东、邓小平、习近平的著作。要把中国的历史、外国的历史、政治史都研究一遍。能多知道一点是一点。

另外就是突破自我,要有想象力,用想象力扩展自己的人生图景。已经有的、已经熟悉的成就,就这样了。没有的经验、没有的成就,也应该试一试,也许就能做成。没干过的行当,也可以把它写出来。没创业,不等于不能写创业。你没当过间谍,不代表你不能写出“007”。扩展的余地极大,所以写作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,但写作也是一个痛苦的事,你会碰到各种困难、各种挑战,付出一定的代价。

写《铁鼓》的君特·格拉斯,有一个关于“为什么写作”的回答:因为我别的都干不成啊!我今天说这个话,有人会对我有意见,王蒙带头贬低作家、贬低文学。其实这个回答并不是贬低文学,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你,如果你要从文学创作,那就做好准备付出代价。中国古代有很多大作家,都是因为科举过不了关,才开始从事文学创作。蒲松龄但凡科举能过关,他也不能写鬼啊、神啊、狐狸啊;吴承恩但凡能过关,也不能写猴啊、猪啊。所以,说别的都没干成的作家,有一种苍凉,有一种悲怆,表达的意思是说把自己献给文学了。

毛姆的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以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·高更的生平为素材,讲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思特里克兰德的故事。他人到四十岁了,收入颇丰,家庭幸福。有一天,他夫人发现他状态不太对,心不在焉,有时候还夜不归宿。问又问不出来,就找了一个私人侦探,查一查这人在闹腾什么呢?经过缜密的调

查,发现他喜欢上了艺术了,正在钻研画画。他夫人一听就哭了,如果他喜欢女人了,我可以让他两年内回心转意。如果想抢银行,我现在就报警,判他几年,出来之后,依然会老老实实地跟着我;如果要是吸毒,我就送他到戒毒院戒毒;但他迷上艺术了,我的人生已经完了,不能再对他抱任何希望了。她付钱给侦探并告诉他,你不得泄露这个消息,如果传出去,我就去法院告你。毛姆把这样一个故事写得既生动又耐人寻味。在常人眼里,迷上艺术,这辈子就完了。当然,高更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画家。“满地都是六便士,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”。跟大家引述这样一段故事,是想表达我们要要有献身文学的准备。

王蒙先生在旁征博引的表达中不失幽默,他调侃自己,“我这个耳朵啊,在这次座谈会上,我发现我高估它了。大家的提问,离我三米远的,我都听不太清。但主办方还是想让我这个聋子、看起来写了很多书的人跟大家讲一讲。这看起来有点像一个幽默小说了。”当听到有

心静气地找,就一定能找到。果然,在卫生间通往卧室过道的墙角边上,半个眼镜片静悄悄地躺在那里,我把它捡起来交到王蒙先生的手里,他欣喜若狂地看着我,连说三句不得了!我们帮助把镜片安上并嘱咐他,回北京再去眼镜店紧一紧。他频频点头。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,王部长,作为奖赏,您能给我的《青春万岁》签个名吗?他爽快地答道,没问题,签一千本都行。他挥笔在书的扉页签上:“建伟兄。王蒙”。

王蒙先生的哈尔滨之行短暂而又丰富,在送行的高铁站台上,他边走边对我说,这个年纪有时候难免犯懒,但我坚持每天走六七千步,每周游两次泳,每次400米,走路我已经坚持了16年了,游泳坚持了70多年,只要你认定对你有益的锻炼方式,你就坚持到底!

临别之际,我握着先生的手,真诚地邀请,欢迎您再来“尔滨”!

我现在写作的时候,写到哪一行,想尽办法最大限度熟悉它、了解它。如果写到吃,最好写得和一级厨师的感觉一样;如果写到穿,最好和中央美院的设计专业的博士感觉一样;如果写到政治,最起码要深入研究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毛泽



本报记者 刘玉玺摄

